

青未了

齐鲁晚报 随笔 星期三 2015.4.1 A21-A24



【山师故事】

张蕾教授与山师故事

□魏建

“山师建校元老、中文系教授、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原研究生导师、山东省写作学会原会长张蕾先生今晨仙逝，享年88岁。”

这是今年2月4日上午我发在研究生同学微信圈里的讣文，当时我正在去张蕾先生家吊唁的路上。几分钟后，微信圈开始出现一个又一个哀悼的图像与文字，本市之外还有贵阳、深圳、上海、天津、德州、海口、北京、青岛、合肥的……同学们纷纷寄托哀思。接下来这微信圈沉默了很长时间，同学们都失去了往日开玩笑的心情，又像是在继续默哀。

张蕾老师并没有教过我，但我与他很有缘分：我的多位授业恩师都是他的至交；张蕾老师所有的研究生都是我的好友。随着与他交往的加深，最吸引我的是听他讲山师的故事。后来我经常为山师学生和青年教工做《历史上的山师人》讲座，起因于此。

1948年秋济南解放后，中共华东局创办的华东大学（简称“华大”）进入济南。张蕾老师考入华大教育学院。后来华大主体迁至青岛与山东大学合并，留下教育学院与山东省行政学校建立山东师范学院。1950年秋，山东师范学院正式成立，张蕾老师是创建人之一。

作为创校元老讲山师过往的人与事，解开了许多关于校史的疑团。例如山师的源头就是一个谜。在华东大学教育学院和山东省行政学校之前，还有哪所学校是山师的前身？渊源最近的应是民国时期的山东省立师范学院，可为什么山师校史没有接续这种联系？

张蕾老师告诉我，在这方面，山师与省内其他同类高校的确不同。例如山东农业大学的前身之一就是民国政府建的山东省立农学院，济南解放时被共产党人接收，原来的教师、学生、校产和校址一起变成了新中国的山东农学院。旧中国在山东的其他高校都是如此“转身”的，唯有山师是一个例外。济南解放前夕，原山东省立师范学院主楼被意外的火灾烧毁。当时的院长找民国山东省主席王耀武要钱建楼，遭到拒绝，于是院长和留下来的师生各奔东西。当解放大军进城要接收这所高校时，校园里空无一人。山东省立师范学院就这样消失了。济南解放后，留在济南的老山师人有的进入华大教育学院，有的回到1950年

成立的新山师。张蕾老师说，虽然新山师的教师多是老山师的人，但他们都不愿意提这一壶。这不仅是为了解断与旧社会的联系，更是因为山东师范学院是新中国在山东建立的第一所高校，他们以此为荣。

还有一个山师之谜：1950年建校的山东师范学院是省内其他同类学校的“小弟弟”，可为什么短短几年就能后来居上，进入山东省属高校的前列呢？

说起这个话题，张蕾老师讲得特别生动，用的都是只有亲历者才熟悉的鲜活语言。他用当时山师人编的顺口溜来

描述山师建校之初的寒酸：“大学的牌子，中学的院子，小学的房子。”“大学的牌子”是说校名，“中学的院子”是说校产（济南蚕桑学校），“小学的房子”是说校舍（蚕桑学校之前是棋盘街小学）。

在这样一个可怜的基础上，山师是靠什么迅速崛起的？按张蕾老师的说法，主要是沾了“院系调整”的光。1952年中国高校的院系调整，本是

一次失败的改革：一批名校消失了，一批名校拆散了，绝大多数高校元气大伤，只有极少数院校得到加强。在山东，齐鲁大学被撤销，山东大学被削弱，只有山师是被加强的。一代名校齐鲁大学的物理系、化学系、生物系、天算系和部分文科系的师生及其图书资料、仪器设备进入山东师范学院，最宝贵的资源是其中的教授和副教授。除齐鲁大学外，一些外校的教授、副教授也被“调整”到山师来。我查阅了有关档案：1950年山师建校时，教授10人、副教授9人；1953年院系调整结束后山师拥有教授33人、副教授26人。这些人有许多是名校都求之不得的大牌教授，如章益、田仲济、留润洲、传统先、刘质平等。山师不再是中学的院子、小学的房子，而是精英荟萃的真正大学的样子：教授多，“海归”多，名流多。昔日暗淡的山东师范学院一下子变得“星光灿烂”。

正是这些人的加盟，带来了山师的崛起。张蕾老师天生一副英雄豪侠的“范儿”：天庭饱满，膀大腰圆，大脑袋，大眼睛，鼻直口阔，说话声若洪钟，走起路来威风凛凛。让你想不到的是，作为文学教授的张蕾竟有武功！他的一个硕士研究生是习武之人，知道老师功夫不浅，有一天硬逼



老师露一手。张蕾老师以60岁的年龄，并且是不平等过招——让这个小伙子拿着水果刀向他进攻。结果：老人空手夺刀，小伙子还没怎么反应过来就被他制服了。从此，张蕾老师在我心中成了学者里的侠者。

据我的所见所闻，他血脉里的确沉潜着一种血性而正义的豪侠精神。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余修书记（当他的业余秘书），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管梅谷校长（好朋友），许多领导都很欣赏张蕾老师，但他从不攀高结贵，更没有为自己捞半点好处；为了别人，他常常是“路见不平一声吼”，除了得罪人，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也许，正是这侠义品格，使他讲述的山师故事充满抑恶扬善的传奇。这些故事可以组成山师历史的两份清单，一份是正面的，一份是负面的。

正面的如博学的章益教授，且不说他既是教育学大家又是心理学大家，也不说他的旧体诗词创作水平令中文系教授啧啧称赞，单说他翻译莎士比亚剧作在上世纪80年代创造了一个奇迹——“各路英雄公推章益”。再如物理学家留润洲教授，“文革”时批斗他的人控诉他“崇洋媚外”的证据之一是不说“化油器”，非说“carburetor”。留润洲马上纠正控诉者的英文发音错了。接着就是对他一顿拳打脚踢，伴着“留润洲不老实，就让他灭亡”的口号声。口号声停了，留润洲还在嘟囔着：“就是念错了嘛……”听了张蕾老师讲田仲济的故事，我才理解为什么田仲济教授百年诞辰纪念会能由数家“国字号”单位主办，还能上央视《新闻联播》。

由此我联想到一个现象：越是有名高校学子越发显得热爱自己的母校。难道名校就更可爱吗？不会！母校就像我们的母亲，没有哪个儿女因为别人的母亲漂亮就厌弃自己的亲娘。然而，热爱母校是需要载体的，那些名人故事就是传承母校感情的重要通道。名校的名人多，故事多，所以传递母校感情的机会就多。山师虽然是个小学校，但我们也值得传颂的大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故事！只是很少有人讲这些故事罢了。张蕾老师就是这样一个能讲山师故事的历史老人，可惜他走了，他把没有讲完的山师故事也都带走了……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什么叫成功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肯定见仁见智。名人的成功倒是好说些，如体育明星世界大赛上夺冠了，就意味着自己职业生涯的成功；歌星红了出名了赚钱了，就意味着成功；科学家有了发明创造，也收获了成功；商人们赚了个盆满钵满，政客们捞足了政绩和面子，也是成功。不过，除了名利，就没有衡量成功的其他标准了吗？就普通人来说，我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理想和追求千差万别，那么，我们的成功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？

在遥远的过去，普通人的生活有很多可比的方式。例如，我不比你有钱，但我比你有文化；我不如你官做得大，但我比你有情趣；我比不上你的家庭背景，但我有一帮相守的朋友；我没有一个看似体面的固定工作，

【社会观察】

被曲解的成功观

□刘天放

但我有相对丰富的精神世界；我比不上你的家境殷实，但我有更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……几乎每个人都能找到尊严，度过有成功感的一生。每个人都可以或庄稼人或商人、或建筑工或革命者、或哲学家或猎人、或渔夫或诗人地潇洒一生。宗教、宗族、帮族、乡会、行业协会等等，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能从中获得生存感、满足感、意义感、成功感的空间。

以前人们心中敬仰的不少成功人士，要是按照当下的标准，几乎都是失败者。而这种人过去又不是凤毛麟角，而是大有人在，不像现在已成珍品甚至孤品。傅斯年主政台湾大学期间，同在台大教外文的夫人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的嫡亲孙女，“国防部长”俞大维的妹妹，可是，有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和职位的傅斯年，抽的是劣质烟，穿的是有补丁的衣服，有时夫人还要借钱买米。那么，傅斯年这么生活究竟图什么？傅斯年们当时秉持的是“忧患之心”，他们要做精神巨人，而又有谁敢说他们的一生不成功呢？

也许，傅斯年们认为生命的价值不仅在于物质的多寡，还在于理想、文化、品质等的追求和呈现以及更高境界的精神满足。要是把这些跟凡事必功利的人谈起，恐怕多是鸡同鸭讲，因为功利者只是“消费专制”和“市井专制”下的奴才而已。

当下，人心仿佛有些浮躁，都想快速致富或成名，少了甚至没了矜持、耐心、毅力和风度。如今我们好像对成功的评判标准变得单一而世俗了，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似乎只剩下了权力和金钱，所谓“名利”就是指它们，且这种观点根深蒂固。多年不见的老朋友、老同事、老同学、老战友、老邻居，一见面不问你活得是否开心、家庭是否和睦、工作是否如意、自己心中的理想是否实现，总要开门见山地问你“挣多少钱”或者“官至几品”。画家们比的是谁的画价最高，教授们比的是谁的项目多、科研经费多，导演比的是谁的票房高，医生比的是谁的“外快”多……少有人去关注、去深究画家的画质量如何、教授的课讲得如何、科研是否经得起考验、导演的剧目是否有新意、医生的医术是否高明、医德是否还存，却满眼都是金钱和名譽。要是以“老套”的标准鉴评，如今那些“台面人”之成功恐怕多数要打折。前段时间蒋方舟在谈到网络作家收入“富豪榜”时就曾言：“我不知道如果一个作家因为钱赚得多而被人关注，这有什么可喜滋滋的？要是我，我会感觉到有些羞耻。”

你看电视里那些“鉴宝”节目，宝贝被鉴定为多少钱，卖出价与买入价一经鉴定，就是标尺；你看明星或作家的出场费和作家收入榜，就是标准；你看官员们按级别的特殊待遇，就是证明；你看画家的画以几十万、几百万一平尺来计算，就是事实；你看亿万富豪征婚时为靓女和佳人们量身定做的标准，就是现实……此类“明码标价”均与金钱和权力紧密相连。而粗茶淡饭或品味生活情趣的呆子们、书痴们，只能甘拜下风？

在单一且世俗的评判标准下衡量成功，不可能有多少人还愿意坚守，这造成了价值观扭曲、追逐名利、学养倒退、道德滑坡甚至沦丧。自己在权钱上早已迷失，还哪来勇气成就自己心中的理想？想过一种“家徒四壁”却还有尊严的精神生活，就是当下的乌托邦，必将与这个消费至上、无钱权就无能的时代格格不入。金钱是好东西，而权力拥有了也不是坏事，只是它们并非唯一。再谈成功，在这个只论金钱多寡、官当多大的成功标准里，我们就无法理清个人在浩森社会中的真实价值，故多数人不能“成功”，而其中能做到远离名利且刻意坚守的人，还剩多少呢？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（威海）翻译学院副教授、文化学者、自由撰稿人）



悦读·分享

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“青未了”。